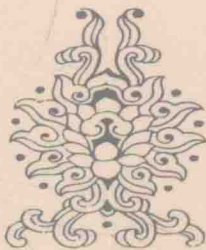


学科视野中的 40—70年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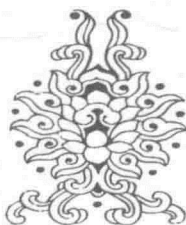
曾令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学科视野中的 40—70年代文学研究

曾令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科视野中的 40-70 年代文学研究/曾令存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21-5130-1

I. ①学… II. ①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6327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学科视野中的 40-70 年代文学研究

曾令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24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30-1/I · 404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与研究(代序)

旷新年

曾令存先生寄来即将出版的《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希望我为书稿写序,这任务对我来说太艰巨了。以下内容只是我读完令存著作后的一些感想。

1950—1970年代的文学被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是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应,中国新文学也被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当代文学的发生曾经被看作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对现代文学的超越。当代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过程,也就是“人民文学”代替“人的文学”的过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的文学革命,是当代文学或者说“人民文学”的重要起点。周扬说:“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①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周扬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进行了区分,它隐蔽地构造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不同等级和传统。“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代表了“新中国文艺前途”,体现了对

①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

于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规划,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雏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解放区文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产生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形式和语言。

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遭遇了深刻的危机。曹文轩在《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是一个被不断受到质疑的概念,“当代文学”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和“不合法的概念”。^①与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挑战和危机相应,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1950—1970年代文学的内容被不断缩减。这种情形,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自从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1950—1970年代的文学价值被不断贬低,新的历史空白论日益流行。在与李杨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通信中,洪子诚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是同两个不同的文学史系列、两种不同的文学评价系列进行对话,一种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确立的文学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文学史讲述为左翼文学史,并把“当代文学”看作是比“现代文学”更高一级的文学形态。另一种出现在80年代,它不断削弱“左翼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在“多元”和“文学性”的框架中,突显被原先的“激进叙事”所掩盖的部分。^②1950年代确立的左翼文学史叙述和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建立的自由主义叙述构成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模式。由于1950年代所确立的左翼文学史叙述遭到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挑战以及左翼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被颠覆,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危机。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指出,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一文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来观察当代文学史被忽略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他说,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1980年代确实表现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强大优势和压力。但是,在1950—1970年代,则正好相反,是当代文学对现

① 曹文轩:《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②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代文学的优势和压力。“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当代文学’阐释的价值和‘可能性’,确实在这十多年中,出现了‘危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①

由“重写文学史”导致的当代文学的危机,也就是“人民文学”的危机。“重写文学史”的产生离不开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新时期”普遍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封建主义复辟”,李泽厚把中国现代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刘再复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从五四的顶峰跌落的过程,因此提出“回到五四”和重新启蒙的要求。“新时期文学”重申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主题。“新时期文学”被视为是五四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传统的回归,或者说是五四的一个重述。反封建、民主、个性解放、爱情、人性、人道主义等五四的主题和启蒙要求在“新时期文学”中被重新叙述。1980年代发生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就是以“启蒙”和“人的文学”为价值坐标重估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价值。南帆指出:“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存在的中轴线是——现代化。”^②“重写文学史”用“现代化”的标准取代了有关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的内涵。确实如张颐武所指出的,在1980年代,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具有巨大的学科优势,“新时期”文学批评普遍挪用现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例如季红真著名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就是挪用现代启蒙话语来进行当代文学批评。

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思想追求和知识活动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从1980年代的“追求现代化”到1990年代的“反思现代性”。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乐观以及国家与知识分子取得共识的时代。与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相应,文学知识分子将之在文学领域里表述为“文学现代化”。199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并且因此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新左派”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1980年代的启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8—9页。

② 南帆:《隐蔽的成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蒙话语提出了反思。在19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知识视野里,当代文学或者说1950—1970年代的文学获得了新的阐释和评价。这种新的视野鲜明地体现在1993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杨的博士论文《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里。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的跋中明确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意义”。非常巧合的是,同一年,在海外,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不约而同地,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将延安文艺和左翼文艺称为“反现代性现代先锋派”。^①《再解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著述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再解读”的学术现象。^②唐小兵和贺桂梅都提到“再解读”和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关系。《再解读》的第一篇序言刘再复的《“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直接把“再解读”纳入“重写文学史”的进程中。然而,《再解读》与其说是“重写文学史”的延续,还不如说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拨。《再解读》中“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将文学重新引进了新的场域之中,对左翼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新的解释。李杨认为,《再解读》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把这些‘红色经典’重新纳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在于提示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③《再解读》被人视作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被人视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④

在以上这样一种语境中来看曾令存先生研究的意义,也许会更清楚些。《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讨论的是二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真正形成了一种

① 唐小兵:《大众文艺与通俗文学:〈再解读〉导言》,《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② 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唐小兵、黄子平、李杨、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④ 郑润良:《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多元化的格局和状态,涌现出了众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试图回应和解决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堆积的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但如何系统地对这些成果进行清理,考察它们与1980年代以来知识界与思想界形成的微妙互动,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诸多问题研究的推进,却明显滞后。甚至滞后于这些年来学界热衷的“重返八十年代”话题。从这一点说,曾令存先生所作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作者采取一种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放在学科史的视野里进行审视,清晰和准确地勾勒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内在脉络,切中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章《当代文学图景的想象与重构》,概括和描述了受二十年来的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所出现的“人民文学”、“人的文学”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三种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想象与重构方式,并指出它们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的内在紧张和张力。有关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构造和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探讨和思考,作者在第四章梳理了这一问题,其中对近年来关于1950—1970年代培养工农兵作家对当代文学影响的研究的清理,尤为值得关注。“文革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考验,第五章聚集这一问题,提出了“文革文学”及其研究的可能性的问题,以及如何对这十年纷繁而纠缠的地下文学材料进行历史化和学理化处理。第三章讨论了近二十年来的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等有关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如对当代文学的“内部形态”研究,关于当代文学“非主流”文学现象的关注等,或隐或显地夹杂着对1980年代知识活动和文学研究的反思与深入。

当然,在一些问题上,该书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应该有一个更宽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与视野,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同时隐藏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多问题的对话,而且它们面对的问题也不局限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学科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中国现代文学构造或者说是提出来的。而这样,也更能够体现书中所讨论问题的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价值。

历史地看,我们当下所讨论的“当代文学”,终将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和“不合法的概念”。但在“当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之前,历史化与学科化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很重要。曾令存先生选择学科史的视角,长期持续地关注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阅读了大量的材料,披沙拣金,凝聚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这种爬梳和整理是很有意义的。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在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力都是值得赞赏的。令人可敬的是,尽管作者身处僻地,却保持着良好的与当代学术对话的能力。

2013.9.26 清华园

目 录

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与研究(代序)	旷新年(1)
第一章 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概念”	(1)
一 “问题概念”的背景	(1)
二 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12)
三 推进研究的主要原因	(18)
第二章 当代文学图景的想象与重构	(31)
一 人民文学	(32)
二 人的文学	(47)
三 反现代的现代性文学	(55)
四 面对复杂性的当代文学阐释	(64)
第三章 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72)
一 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	(73)
二 当代文学的“内部形态”研究	(87)
三 当代文学异质的寻找与发现	(99)
四 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与意义结构研究	(111)
第四章 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	(132)
一 “转折”的提出与研究	(132)
二 1948,“转折”中的年份考据	(146)
三 在“转折”中重组的作家队伍	(157)

四	文化转轨与新文学传统的重构·····	(168)
五	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	(183)
第五章	“文革文学”及其研究的可能性·····	(195)
一	研究现状与文学史叙述·····	(195)
二	“地下文学”的搜集与研究·····	(205)
三	“文革文学”的文学性与现代性·····	(216)
第六章	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及其他·····	(227)
一	研究的观念、立场与方法·····	(229)
二	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	(233)
三	历史态度·历史化·····	(237)
附录	1948—1949:《大众文艺丛刊》·····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76)

第一章 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概念”

“问题概念”的背景

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推进研究的主要原因

一、“问题概念”的背景

1. 概念的演化

这里的“40—70 年代文学”(即“20 世纪 40—70 年代文学”),与其说是一个用来描述文学史的“时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用于考察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概念”。在本书后面即将要展开的讨论中,“40—70 年代”首先是指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也即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然后才是指由此延伸出来的 40 年代初和 70 年代末——包括延安(解放区)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前几年。在 90 年代以后的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实践中,“40—70 年代文学”有时还包括这一时期港澳文学在内的所谓“两岸三地文学”,而所谓的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更是“40 年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于本书的研究动机与目标设计,这两方面的内容均未纳入后面的讨论范畴。

在这种情况下,“40—70 年代文学”基本与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描述的作为学科概念的“当代文学”基本是重合的。在 80 年代以后关于作为“历史叙述”(即文学史)而不是“文学事件”(即文学评论的对

象,主要指“当前”、“当下”的文学)的“当代文学”表述中,40—70年代是其中一段绕不过去的重要时期。如在80年代中期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著作中,作者便把“当代文学”的时间定位在1949—1978年,认为这一时期“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它的直接源头,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①与此同时,80年代初的不少当代文学史著作,也都是把1949—197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段来叙述的,如“新时期”第一部由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②即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写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即使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及“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起步,作为学科命题的“当代文学”,仍有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当代”与“当前”、“当下”区别开来,把“当代文学”的时间定位在50年代以后,“其内涵和依据在于,这是一个“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50年代‘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到80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③在这一“当代文学”学科观念中,40—70年代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重要时段。

但严格地说,只有在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40—70年代文学的研究才不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换句话说,在启蒙主义高扬的80年代,基于非纯粹的学术化思想立场,一些涉及40—70年代文学话题的论述,还不足以构成具有文学史研究意义的学术事件。即便有,也还是初步的。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1985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事件。^④90年代曾有研究者指出该文作者在

①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出版。

② 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出版。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

④ 《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发表了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述了作为文学史概念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内涵,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接着,《读书》从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连续6期开辟专栏,刊发他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7月和10月先后举行了两次相关的座谈会。有关内容可参考由他们仨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讨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现代美感特征等时,即暗含着将 50—70 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来处置的偏颇。这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与他们所坚持的审美主义的纯文学观念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我以为还在于他们坚持的 80 年代主流话语即思想启蒙的立场,并据此来质疑这一时期(50—70 年代)的文学的“现代”与“世界”品质。学术评价在这里被转化为思想评判。另一个例子,是几乎也是在这一年由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①“整体观”把中国新文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二阶段始于 1942 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第三阶段则始于 1978 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其中的第二阶段实际上主要是指 40—70 年代文学。“整体观”用“民间”来概括、描述这一阶段文学的品格。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体观”作者的知识谱系中,这种“民间”品格固然是文艺的,而在具体阐释中,可知“文化”的比重要显得更大些。另外,这“民间”,也是一个精英文化立场与视野中的“民间”。“整体观”所描述的“中国新文学”,是一个以 80 年代的“新启蒙”为思想资源的文化学意义上的,作者的文学史意识几乎无法从其文化史意识中剥离出来。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学术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实践的“整体观”,其成果与影响主要还是在 90 年代以后,标志是对一时期“潜在写作”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编写与出版。

不过,尽管作为一个相对被认可与接受的概念,“40—70 年代文学”被明确提出并赋予学术意义是在 90 年代以后,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80 年代的这些工作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或者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入 90 年代以后,对 40—70 年代文学的关注与思考方才逐渐演化成为自觉的学术实践,并先后涌现出包括“再解读”研究

①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3 期发表了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文学史观念,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遥相呼应,直接推动了 80 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2001 年先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初版和修订版。2010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思和著的《新文学整体观续编》。该书集中地收录了作者 90 年代以来关于文学史理论探索的代表性文章。

在内的相关著作,以及一些代表性的文学史写作实践。这些研究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直至今今天仍具有一定讨论价值。如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来描述这三十多年文学的依据在哪里?从“一体化”或者“体制化”、“制度化”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是否万无一失?怎样看待站在“民间”的立场,借重“潜在写作”的理论与方法重新打捞这三十多年文学的文学性的有效性与限度?作为发轫于五四新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意义在哪里?如何理解40—70年代的文学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内涵?“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这一命题成立吗?作为方法论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这一命题的意义在哪里?等等。这其中不少问题直至今今天仍在困扰着我们。正是这些困扰,直接促成了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在北京昌平举办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使“40—70年代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概念”。昌平研讨会赋予了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当时不少学者对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研究的意义与存在问题等提出自己的看法。^①以此为标志,把40—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问题概念”

① 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可参考2004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世纪4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问题与方法”一组笔谈。钱理群认为,对于“当代文学”来说,“40年代文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40年代文学研究”具有“发生学”意义,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起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的作用”。(钱理群:《一个亟待开发的“生疏地”》)赵京华也指出,若把这一段文学放回整个“现代文学”(包含近、现、当代)中去,从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关系去考察这一段文学史,则可发现一些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无法看到或者被遮蔽了的文学特性,如“现代文学的制度化性格”,一开始即与民族国家制度建制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共谋关系”。(赵京华:《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吕晴则认为40至70年代文学,从另一个方面看,“是战争动员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左翼文学发展到“文革文学”,“我们看到文学一步步走向原教旨:个人的一切有碍于将自己奉献于国家的欲望,需求被压到最低,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最终成了无私也无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吕晴:《现代战争动员体制与40到70年代文学》)杨联芬甚至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认为40至70年代文学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审美读本”,在“当代主流文学”视野内考察这一时段的文学,能够看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研究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和心灵史,都不能不研究这一段的中国文学。(杨联芬:《40到70年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提出来,试图从中寻找到解决与此相关问题的答案,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已达成共识。

从专业研究角度看,把40—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说是对我们长期规训出来的专业思维定势的挑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学者即提出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来整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或者调整目前名不符实的学科分期,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事实上,从目前为数不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看,^①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由于各种原因,如各自的文学史观念与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相对指称依然是今天大学教学与研究的约定俗成:作为全国性的学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亦一直独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亦坚持分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在告诉我们,本书在这里把40—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讨论对象,需要跨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专业限制。

2. 研究的意义

但如果因此认为把40—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是为了黏合长期以来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展开问题的初衷。不用说,“40—70年代文学”这一命题根本难于担当起整合这一学科的重大问题,而充其量只能为这一问题讨论的展开提供一些观测的角度。而从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角度论,这些可能性也正是我们提出40—70年代文学命题的主要背景。具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其与延安文学的关系。把1949年作

① 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主要有三部,分别由黄修己主编(上下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4年修订)、孔范今主编(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严家炎主编(上中下册,高教出版社2010年出版)。2008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德国汉学家顾彬著、范劲等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叙述起点，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成为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言自明的默契。但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命题的提出与建设，随着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元素如学科特性、话语方式、概念术语等的挖掘，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资源与历史依据的寻找，不少研究者终于发现“1949”的设置并不能把问题说清楚。比如当我们用“社会主义文学”来描述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它关于这种性质文学的意义的描述，作家的身份与存在方式，作品的出版与流通传播，文学批评功能的表述等等，都不是“1949”一夜之间生成的，这在周扬 1949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已有很形象的说明，比如在谈到“新的人民的文艺”（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与“社会主义文学”通用）的一些特征时，如文学创作的主题、描写对象、人物形象塑造、创作方法等，周扬举证的对象都是延安（解放区）文学。又如，当我们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早引介到中国，是周扬发表在 30 年代初的一篇文章；^①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界真正产生影响，则在 40 年代以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取得了主导地位之后，而延安——解放区的文艺实践显然是最有力的说明。可见，以“1949”为起点来讨论 1953 年第二次文代会正式确立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容易因为缺乏前理解背景而语焉不详。再如，从“现代文学”发展到“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队伍的变化，如一批曾经活跃在“现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在“当代”文坛日渐“隐失”，同时还会发现延安时期投身革命的作家（或者文学青年）和 50 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作家，几乎成了“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这种情况当然与 1949 年大陆新旧政权的更迭有关，但近十多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要复杂得多。以

① 周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四卷一期，1933 年 11 月 1 日出版。